



/社/会/学/研/究/文/库/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 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研究

——住房阶层理论的视角

魏万青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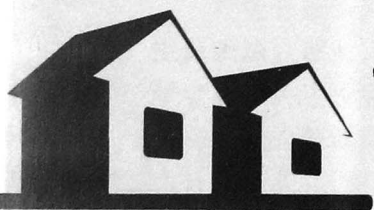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 社 / 会 / 学 / 研 / 究 / 文 / 库 /

- 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资助成果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社会转型与城市居民住房不平等的机制研究”（13XJC840002）资助成果
-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贫富分化与社会和谐：城市居民住房视角的研究”（09ASH001）资助成果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 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研究

——住房阶层理论的视角

魏万青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研究:住房阶层理论的视角/魏万青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680-0714-6

I. ①社… II. ①魏… III. ①城市-居住-问题-研究-广州市 IV. ①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2118 号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研究

——住房阶层理论的视角

魏万青 著

策划编辑:张馨芳

责任编辑:封力焯

装帧设计:范翠璇

责任校对:曾 婷

责任监印:朱 玟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4 插页:1

字 数:251千字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PREFACE

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经典传统,也是中国社会学者研究的主流领域。目前,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关于分层标准尚未达成共识,相关学者更多关注阶层形成而忽视阶层关系结构研究,缺乏一种关于中国社会阶层分析的整体理论框架。本书选择广州地区为研究个案,以住房资源作为分层标准,试图回答:作为市场转型的重要部分的住房制度改革对住房不平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住房阶层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利益关系(阶层关系结构)?具体而言,本书共分为以下四章:

第一章是理论综述与研究设计。主要回顾了社会转型与住房不平等研究的相关理论与经验。笔者认为,以往研究主要是在市场转型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忽视了因果机制研究,在方法上是一种回溯性研究,无法解释社会转型与住房不平等之间的复杂机制。而住房分层或住房阶层理论并没有清楚回答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要跳出市场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关注具体制度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关注不同住房改革政策在不同阶段、不同制度环境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中国城镇住房不平等的形成过程。同时,关于中国城镇住房不平等研究应不满足于解释这种不平等是系统性不平等,还应回答为什么住房资源是一种改变个人命运处境的资源,即跳出住房消费的框架,阐明这种资源不平等背后存在的一种资源再分配关系,回到生产视角,回答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二章主要关注住房市场化与住房不平等的关系。笔者认为中国城市住房市场化进程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广州住房市场化进程亦是如此。这使得广州住房不平等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与场域性特点。同时,住房制度改革以及政府角色变化,使得住房属性发生了本质变化,住房

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种资源,这使得住房资源的获得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过程,行动者越早调整行动策略,越早进入住房投资市场,越能调动资源,就越处于有利位置。由此,体制内行动者由于有更多制度性支持,在住房获得过程中处于优势;房改前入职的“老人”优越于房改后入职的“新人”。其结果是住房市场化的过程也是住房不平等差距扩大的过程,这种差异并非随机性的,而是系统性的,因此,住房市场化过程也是住房阶层形成的过程。

第三章主要讨论住房分层体现怎样的阶层关系。这一部分中,笔者在回顾以往学者对住房阶层(housing class)理论^①批评的基础上指出,住房阶层理论批评者们往往将住房资源视为一种消费品。然而,在经济学中,住房资源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消费品,而是一种投资品。笔者跳出消费社会学框架,关注住房的投资品属性,探讨住房阶层之间的关系与利益结构。在回顾中国住房改革历程与中国经济模式特点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住房资源是城市居民分享发展红利、获取投资型经济增长溢价的重要载体。经营城市的发展模式,使得城市类似于“公司”,而投资不动产就是购买“公司”的股票,成为“公司”股东的行为。因此,住房阶层之间不仅仅是消费能力的差距,更是“生产剩余”分配的差异。

第四章是结语部分。首先是对住房阶层形成过程的总结。本书以住房资源作为分层标准,以广州市为例,阐述了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资源的获得与分层过程,进而回答了各住房阶层之间的阶层关系。本书作者研究发现,将西方工业化假设用于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并不适合。在我国城市居民住房获得过程中,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不仅体现在住房改革制度设计上,还体现在房改后以住房为载体的利益分配机制上。以往社会分层研究将市场机制、权力机制与个人选择机制视为对等的作用机制,这并不符合中国社会转型的事实,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个人选择机制,都是在权力机制规制下运行,受国家机制(权力机制)的影响与形塑,因此,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应该“把国家找回来”,回到具体制度分析。其次是对住房阶层理论基础的论述。综合以往关于住房阶层理论的质疑,本书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特点,回答住房与社会发展红利的关系,认为住房不仅是社会激励体制的主要部分,构成了居民财产的主要来源,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因此,不能仅从消费属性理解住房,而应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下理解住房与社会分配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住房阶层进行划分。

^① housing class,一般翻译为住房阶级,本书对“住房阶级”、“住房阶层”不做明确区分,更多使用“住房阶层”一词。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理论综述与研究设计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1
一、选题背景与现实意义:住房获得与命运的三岔口	1
二、选题理论意义:社会转型与住房不平等	3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5
一、市场转型理论:相关理论与问题	5
二、住房分层理论:渊源与发展	11
三、本书关注问题、研究框架与相关假设	15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	20
一、研究方法	20
二、资料搜集	23
三、一些关键术语处理	25
第二章 住房市场化与住房不平等	28
第一节 社会情境原理:住房市场化背景与渐进性特征	28
一、面向具体经验的制度分析与机制分析	28
二、社会情境原理与制度网络	30
三、住房市场化背景与阶段性特征	32
第二节 单位住房生产体制时期:增量改革逻辑与住房不平等	43
一、1978—1989年:住房短缺与住房增量改革	43
二、承包制、住房单位生产体制与住房获得	46

三、单位之间的住房不平等	52
四、单位内部的住房不平等	59
五、小结:单位住房生产体制时期的住房不平等与住房获得	62
第三节 住房双轨制时期:存量改革逻辑与住房分化	66
一、1990—2000 年:住房存量改革与房地产市场发展	66
二、不平等的持续与加剧:单位之间的住房不平等	71
三、单位内部住房分配:不平等的持续与新的变化	78
四、体制之间住房不平等	84
五、1990—2000 年住房获得机制与不平等	91
第四节 新住房体制时期:房地产黄金时代与住房不平等	102
一、中国经济奇迹与房地产市场的黄金时期	102
二、新住房体制中的不平等	106
三、住房市场中的竞争与不平等	113
四、高房价时代基本居住需求的满足	118
五、高房价挤压的基本居住需求:焦灼的白领与“中产” ...	121
六、逐步边缘化城市弱势群体:蚁族、廉租房家庭与宿舍劳工	125
七、讨论:后福利分房时代的住房获得与不平等	127
第五节 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住房不平等	134
一、住房不平等机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34
二、住房获得或住房不平等的“场域机制”	137
三、住房制度改革中行动者适应策略与住房分化	139
四、住房资源获得中的高度竞争	141
五、住房竞争中的代际差异与不平等	142
六、住房不平等的持续与加剧	143
七、余论: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一些讨论	145

第三章 重返马克思——利益关系视角下的住房

阶层理论	150
第一节 住房阶层理论:待解决的问题	150
一、住房阶层理论的渊源与争鸣	150
二、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关于分层的理解	153
三、塞勒尼住房阶层理论与激励体制	156
第二节 住房制度改革、经济发展与住房阶层的形成	157
一、生产视角下的住房改革历程	157
二、房地产发展黄金时期政府角色的变化	159
三、经营型政府经济模式下的经济奇迹与机制	161
四、住房产权背后的财富转移与不平等	168
五、住房阶层的形成与利益关系	173
六、小结:批评与回应	183
第三节 住房阶层理论与其他分层理论对话	187
第四章 结语	195
参考书目	198
附录 访谈资料简介	212
后记	216

第一章

理论综述与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一、选题背景与现实意义：住房获得与命运的三岔口

若干年后，A 君依然会记得去 J 校面试的那个下午。在面试结束后的晚宴中，J 校某领导对 A 君说：“隔壁（指 J 校一墙之隔的某大学，是该省唯一的重点大学）只是听起来名气大一些，他们很多副教授甚至教授还住个两房，我们学院谁没有几套房子？哪怕是水电工，也至少有个三室两厅的房子。”2007 年 7 月 A 君从“隔壁”大学毕业进入 J 校工作，在这建设厅下属、该省唯一建筑类高校，此后他听到最多的话题就是房子。很快学校开始分配（准确地说是出售）有“完全产权”的“市场运作房”。当同事们根据学院相关规定计算自己住房得分与排名选房时，A 君该批次就业的“新人”（在改革中，经常有“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之说，一般而言“新人”是指刚参加工作的人）却被告知编制还没在厅里批下来，等编制下来才能分房。分房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唯一的不快就是某些中层干部已经参与过厅里的“市场运作房”，按规定不能再参加此次分房。但争论很快平息，由于新建住房有“富余”，那些已经参与厅里市场运作房的中层干部也如愿买到自己满意的房子，前提是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老人”分完住房后，“新人”编制很快下来

了,A君也买到一套近140平方米的新房。虽然,如果在第一批次排名的话,他可以选到166平方米甚至更大的房子,但A君依然很满意,因为“市场运作房”非常便宜。签约时价格仅为每平方米1800元,虽然2007年物价上涨,最终价格是每平方米2000元,但仍然很便宜。A君刚来“隔壁”大学上学的时候,这座城市房价并不高——周边一个楼盘广告价格是“2980起”。毕业之际,A君在学校周边看过几个楼盘,那时周边楼盘的每平方米价格已突破4000元。140平方米的住房,每平方米2000元的差价,意味着A君“纯赚”近30万元。

2009年A君离开J校去了另一个城市,而“隔壁”大学西门“荒芜之地”被规划为公园,房价在经过年初的短暂低迷后已经涨到每平方米7000多元;那一年,和A君一起入校的同事已经陆陆续续结婚,其中几位同事的配偶也在J校,参加了“市场运作房”,因此,一些同事变成“多房户”;那一年,J校也开始扩校,同时,为了老校区旧房改造(据说不符合抗震要求)又在筹集新一批住房,由于“人少房多”,这次建房据说不再“有编制优先”了。在A君离开的前一年,A君的朋友周师兄也离开了这座城市,到武汉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A君一样,周师兄也是从“隔壁”大学毕业的,取得硕士学位后在一所医学类本科学校做教师。周师兄所在学校也曾筹备“市场运作房”,但周师兄放弃了,因为建房地址太远了,预算价格是每平方米2000元,“太贵了,国家一直在调控,房价将来肯定会降下来”。于是周师兄退了押金,与这所医科大学签订了委培合同,去武汉读博士研究生,委培合同中明确规定“不包住房”。

以前的同学、朋友A君依然保持着联系。朋友们的命运轨迹也因为住房发生转变。一位师兄毕业去了党委,虽然福利分房早已结束,但他还是分到了一套两房两厅的房子。同时,他们单位在这座城市的会展中心又兴建“市场运作房”,他以每平方米1000多元的价格买到了一套四房两厅的房子,其时周边价格早已突破每平方米4000元。随后他爱人在“隔壁”大学也分到一套住房。而曾经坚信房价会降的周师兄在博士毕业之际充满失落,“学校不给房子了,不回原单位又要赔钱”。短短几年,A君身边的朋友地位落差加大,一些人已经驶入中产阶级快车道,另一些人进入命运的另一岔道口——城市的高房价使得他们的安居梦想变得愈发困难,并被高涨的房价抛离得越来越远。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到内地,甚至从城市波及农村。

这样的故事版本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大中城市。故事背后绝非个体的命运机遇,而是一代人的命运机遇。自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住房成为影响城市居民家庭悲欢离合的重要变量。在房价高涨

的时代,关于住房与财富、住房与家庭压力的报道与故事屡见不鲜,一方面是住房投资给许多家庭带来高额回报,“丈夫办厂不如老婆炒房”^①;另一方面是面对高房价充满无奈的青年白领和为儿女住房而忧心忡忡的父母。在房地产快速发展、城市住房快速上涨的时期,中国经济也被诸多学者称为房地产经济,与此相关的是,土地成为许多城市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有些地方甚至成为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财政”。无论是中国经济发展,还是人口城市化,抑或是大学生就业、青年择偶,过去十余年,诸多社会热点问题都与住房问题密切相关。住房也已经成为城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志,“这个时代愈来愈以资产的多寡来评价个体的成败高低。近5年资产价格的暴涨,迅速拉开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距离。住房数量俨然重新定位了人们的社会经纬”^②。这也是本书选取住房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二、选题理论意义:社会转型与住房不平等

社会分层研究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研究一直都是社会学研究的主流领域。

参照历史研究的叙述策略,如果将中国社会转型视为正在发生的历史与变迁,那么关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分层研究也可以归纳为两种叙事策略:前瞻法与追溯法。前瞻法是置身于历史结点预测未来的可能性。^③ 市场转型理论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正是基于前瞻法的叙事策略。市场转型理论强调制度变迁对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塞勒尼基于波兰尼的启发,认为不同的经济制度类型有着不同的激励机制,从而对应着不同的机会结构,产生不同的社会阶层。^④ 基于塞勒尼的观点,倪志伟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会使剩余资源、财富由再分配者手中转向生产者手中,从而给市场中的生产者提供强有力的刺激,导致新的

① 左娟,徐凤,卢韵如,等。10年前 10万元首付买套三房 10年后 10万元不够买卫生间[N].南方都市报,2011-12-02.

② 袁一泓。从沸腾到癫狂:泡沫背后的中国房地产真相[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1.

③ 李伯重。“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评介[J].史学理论研究,2000(2).

④ Szelenyi I.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2(88): 287-326.

以市场为核心的机会结构。^① 倪志伟是基于当下预测未来,他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观点,是一种理论预测,指出的是未来的可能性,因此,从叙事策略来说,倪志伟的研究是典型的前瞻法。追溯法是站在现在的历史结点上探求引起现在的历史发生的关键因素,与强调预测的前瞻法相比,追溯法更强调现在。追溯法是基于现在回顾过去,因此在理论上更注重解释而非预测。然而,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无论是基于前瞻法的市场转型理论,还是基于追溯法的阶层结构理论,都存在诸多争议。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学术争鸣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外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的热点问题,而关于社会阶层理论,其解释力也备受质疑,如“十大阶层理论”^②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从“从原先的金字塔形逐渐向橄榄形转变”,但这一结论被认为与中国社会结构现实不符,一些学者认为丁字形结构、断裂社会结构更符合中国社会现实。^③

笔者认为,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社会分层标准。只有建立了有效的标准,才能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描述、解释,在此基础上才能回答中国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分层的机制,进而对中国社会结构未来趋势进行预测。

在经验研究中,住房一直是衡量中国转型社会不平等的关键资源。一是在市场转型理论的争鸣中,住房不平等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如,边燕杰及其合作者曾以住房资源作为分层标准,替代收入指标,与市场转型理论进行对话,提出了权力延续论^④。二是在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基于中国社会住房的重要性,以及雷克斯和墨尔住房阶层理论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住房分层理论也有较深入的探讨。^⑤ 事实上,关于住房分层的理论,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有不同的版本,雷克斯和墨尔的住房阶层理论是针对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对城市社会结构的描述,并为国内研究者所熟知,而关于再分配经济制

① Nee V.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5): 663-681; Nee V.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 56(3): 267-282.

② 陆学艺.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 60 年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 1-12.

③ 李强. 社会分层十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④ Bian Y, Logan J R.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5): 739-758.

⑤ 刘祖云, 胡善. 城市住房的阶层分化: 基于 CGSS2006 调查数据的分析 [J]. 社会, 2010 (5): 164-192.

度环境下的住房阶层理论,国内学者对此介绍较少。

总之,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下,住房都是研究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的重要指标。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市场转型理论:相关理论与问题

(一) 市场转型理论的学术争鸣与进展

社会分层研究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研究作为社会学传统主流领域,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到赖特、戈德索普、格伦斯基,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家,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到文化,以不同的视角对现代工业社会,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层机制与结构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分层研究以塞勒尼为代表。塞勒尼从波兰尼的“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和“非市场贸易”概念出发,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称为再分配经济,分析了再分配经济制度条件下分层机制,以及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层机制的差异。^①

那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会对社会分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倪志伟将塞勒尼再分配经济概念和基本假设加以扩展用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②倪志伟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包含资源调拨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从而使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发生改变,导致权力和特权的转移。倪志伟提出了市场权力、市场刺激、市场机会3个命题,并由此推断出10个可以通过经验验证的假设。在经验研究层次上,倪志伟的基本论点可以概括为两点,“即

① Szelenyi I.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78, 19(1-2): 63-87.

② Nee V.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5): 663-681; Nee V.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 56(3): 267-282; Nee V, Matthews R. 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6(22): 401-435.

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回报,而提高对人力资本的回报”^①。

诸多研究者发现了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的不足,倪志伟的主张也引发了大量直接的或间接的反对观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罗纳-塔斯的权力变形论^②、边燕杰等人的权力延续论^③、白威廉和麦宜生的政治市场观点^④、魏昂德的政府即厂商理论^⑤和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⑥,以及刘欣的权力衍生论^⑦。争论基本上是在倪志伟关于权力回报与市场回报的框架内进行,其中权力回报问题是争论的焦点问题。随着研究的发展,倪志伟和塞勒尼对相关观点进行了回应并修正。1991年倪志伟提出了局部改革的观点,认为在改革尚未完成时,再分配经济体制依然起作用,当全面改革到来之际,市场转型理论所预言的分层模式就会出现。^⑧简言之,倪志伟并不否定再分配权力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因为经验现实的前提与市场转型理论成立前提并不相符。在某种程度上,倪志伟和其批评者达成了共识,边燕杰等人的权力延续论也是基于对市场转型理论前提提出的批评,认为中国改革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城市单位制两大制度未发生动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两种制度的持续存在保证了政治权力能够继续控制、分配资源。^⑨但在倪志伟看来,这两大前提现在不变,不代表将来也不变。随后中国改革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倪志伟的预测,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逐步转向城市国有企业,而事业单位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也逐步提上日程。

① 边燕杰.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② Rona-Tas A.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100(1): 40-69.

③ Bian Y, Logan J R.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5): 739-758.

④ Parish W L, Michelson E. Politics and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101(4): 1042-1059.

⑤ Walder A G.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 101(2): 263-301.

⑥ Lin N.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on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J]. Theory and Society, 1995, 24(3): 301-354.

⑦ 刘欣.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4): 101-114.

⑧ Nee V.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 56(3): 267-282.

⑨ Bian Y, Logan J R.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5): 739-758.

(二) 双方争论的焦点:前提还是机制

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依旧在持续,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自说自话”^①,面对相同的经验事实,争论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市场转型理论似乎成为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的一种理论。面对批评者的质疑,倪志伟强调质疑证据与市场转型理论推论的假设前提不同。批评者认为倪志伟的证据来自农村,在农村不存在或者说只在很弱意义上存在代表再分配权力的国有经济,因而其理论可能不适合于工业社会。^②来自城市的证据也反驳了倪志伟的观点。但是倪志伟及其合作者坚持认为市场转型理论是跨越城乡划分与跨前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加以检验的一般性论断,来自城市的数据虽然得出了与市场转型理论相反的证据,但原因是在城市背景下检验市场转型理论尚处于初级阶段,城市的市场转型尚未发生。^③倪志伟等人指出,虽然城市改革已经开始,但改革推进并非一蹴而就,社会变迁存在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以往研究结果之所以不利于市场转型理论,原因是“那个引起系统离开原有状态的临界点并没有到来”^④。

在与批评者的学术争论中,倪志伟对市场转型理论进行了修正,但面对相反证据,倪志伟认为这不是判决性证据,原因是相关经验证据前提与理论前提不相符,其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推论逻辑一直没变”^⑤。如果说倪志伟看到了新兴制度和旧制度的竞争关系,而随后的批评者却看到了“政治与新兴市场之间内在相连的一幅场景”^⑥。虽然倪志伟的批评者指出了市场转型理论与中国的经验不相符,但是,现实总是比理论丰富,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完全解释现实。另外,在中国复杂的转型经验中,无论是市场转型理论,还是市场转型理论的竞争性理论,都能找到经验支持,因此,从学术批评角

① 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 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② Xie Y, Hannum E.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101(4): 950-992.

③ Nee V, Matthews R. 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6(22): 401-435.

④ Nee V, Cao Y. Path Dependent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Stratification in Hybrid Mixed Economies[J]. Theory and Society, 1999, 28(6): 799-834; Cao Y, Nee V G. Comment: Controversies and Evidence in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105(4): 1175-1189.

⑤ 刘欣.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理论争辩的焦点和有待研究的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5): 102-110.

⑥ Zhou X.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105(4): 1135-1174.

度而言,更重要的批评是对倪志伟的推论逻辑的批评。

市场转型理论将权力(政治资本)回报看做是再分配制度的逻辑,教育(人力资本)回报被看做是市场逻辑的反映,且两种资本被视为非此即彼、不相兼容的资本。事实上,市场不只有一种形式,现实中没有“纯粹”的市场制度,权力也绝非仅仅在“非此即彼”中选择。在实证研究中,要对两种制度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更非易事。第一是人力资本的测量问题。丘海雄关于国有企业劳动雇佣制度改革的研究发现,教育不一定代表人力资本,也不一定代表个人技能。^①从这个意义来说,教育并非等同人力资本。第二是人力资本与两种制度的关系问题。魏昂德等人研究发现,即使在再分配体制下(计划经济时代),教育在社会分层中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政治忠诚从来没有成为选拔专业经营的先决条件。^②这也意味着,教育的收入回报并非一定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第三是两种制度的关系问题。在与倪志伟对话中,诸多学者聚焦点在市场转型理论的推论逻辑上,批评者相信,新兴制度与旧制度的竞争关系不符合事物本身发展逻辑。白威廉和麦宜生的政治市场观点、魏昂德的政府即厂商理论和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观点均发现,即使市场化进程已经展开,再分配权力总会有以各种形式获得机会。市场扩张并非一个自生过程,而是嵌入政治关系和原有社会各种网络中的。^③

(三) 可供的选择:转型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分析与机制分析

在市场转型理论中的学术争鸣中,争论双方共享了新制度主义基本假设:在转型社会里,社会分层机制的内在差异取决于制度框架的变化,这一制度框架变化决定激励和机会结构,从而影响财富分配。但在经验检验与对相似事实时,倪志伟和其批评者的解释截然不同。面对与市场转型理论不利的事实,倪志伟、曹洋认为是批评者经验证据取自尚未发生市场转型的领域,或者说虽然市场转型已经发生,但那个引起系统离开原有状态的“临

① 丘海雄. 国有企业劳动雇佣制度改革与工人的理性选择[D].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6: 73.

② Walder A G, Li B, Treiman D J.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65(2): 191-209.

③ Lin N.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on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J]. Theory and Society, 1995, 24(3): 301-354.

界点”并没有到来。^① 倪志伟的批评者则认为,市场转型已经发生,出现与市场转型理论相反的证据并非只是经验取证的前提问题,而是市场转型理论推论逻辑有问题,或者说再分配权力与市场权力的作用机制与市场转型理论蕴含的机制不相同。^② 虽然市场转型理论基于前瞻法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分层机制展开叙事,但无论是倪志伟还是其批评者,在实证时都是采用回溯法的策略——以当下数据寻求资源分配的逻辑与逻辑运行轨迹。相关争论与研究方法有关,诸多研究是从 A—B—C 的因果关系链的视角来理解不同的社会分层后果,其中 A 是指变迁的背景, B 为市场化, C 为市场化对收入和权力分配的影响结果,而在 B 这一环节是多样化的,从而导致在分层环节 C 上的不同。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一果多因并不鲜见,如果只是关注市场转型背景与分层结果,那么因果机制依然是一个“黑箱”,其中依然存在着多种可能。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使得经验研究的结果的解释也充满不确定性。^③

然而,即使概念操作上不存在争议,这种验证策略能解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议吗?

显然不能。因为我们从背景前提、运行机制和结果三个环节来看,仅从结果对机制进行检验,情况也非常复杂。我们假设结果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至少有四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可能是“背景效应”,即是因为背景前提发生了变化,而运行机制不变,从而导致结果发生了变化;第二种可能是“机制效应”,即背景前提不变,而只运行机制发生变化,从而使结果发生变化;第三种可能是背景前提发生了变化,而运行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在结果上如何呈现还是一个值得细究的问题(见表 1-1);第四种可能是前提和机制都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只是一种“随机效应”,一般不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重点。^④

① Nee V, Cao Y. Path Dependent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Stratification in Hybrid Mixed Economies[J]. *Theory and Society*, 1999, 28(6): 799-834; Cao Y, Nee V G. Comment; Controversies and Evidence in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105(4): 1175-1189.

② Zhou X.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105(4): 1135-1174; Bian Y, Logan J R.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5): 739-758.

③ Parish W L, Michelson E. Politics and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101(4): 1042-1059.

④ Lieberman S, Lynn F B. Barking up the Wrong Branch: Scientific Alternatives to the Current Model of Sociological Science[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2(28): 1-19.